

海外视阈下的毛泽东研究

曹景文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 上海 200062)

摘要: 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的重要课题,海外学者开展毛泽东研究已有近 90 年的历史。海外学者高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们认为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的民族英雄;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对第三世界国家有着重大影响。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关键词: 毛泽东;海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5) 01 - 0039 - 08

Researches on MAO Zedong From the Overseas Perspective

CAO Jingwe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MAO Zedong is an important worldwide issue. Overseas research on MAO Zedong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90 years. Overseas scholars appraise highly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MAO Zedong and his thought. They think MAO Zedong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he is China's national hero. MAO Zedong has conducted the painstaking task to explore th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road. Chinese revolution led by MAO Zedo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hird world. Overseas scholars affirm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and realistic meanings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y think that MAO Zedong in many aspects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m, MAO Zedong thought has influence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MAO Zedong; overseas; Marxism; research on MAO Zedong

毛泽东作为一代历史伟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1]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毛泽东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海外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开展毛泽东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们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国内学者重视和借鉴。

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

海外学者开展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至今已有近 90 年的时间。综观海外

收稿日期: 2014 - 08 - 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综述”(编号: 11BKS053)

作者简介: 曹景文(1965 -),男,山东嘉祥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海外中国学。

学者研究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奠基阶段

这一阶段从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早在中共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就有海外人士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共产国际是较早把毛泽东的著作和生平介绍给世界的国际组织。1927年5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登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赞赏此文“字字精炼,耐人寻味”。^{[2][P127]}1935年12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题为《毛泽东——中国劳苦大众的领导者》的文章,高度赞扬毛泽东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杰出的指挥才能等优秀品质,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共产国际》杂志此后还刊登过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致西班牙人民》等10多篇文章。《共产国际》杂志对毛泽东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大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的早期传播。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战地观察家和新闻记者也开始关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美国驻外处官员柯乐布于1931年被派驻汉口,他在多方考察后,写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报告,这是美国人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部详尽的调研报告。1936年6月,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拜访了中共多位领导人。他曾5次采访毛泽东,搜集了有关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大量的宝贵资料。1937年,他根据这些材料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斯诺成为世界上全面报道、介绍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的第一人。此后,有众多的西方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前来陕北,写出多种介绍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著作,主要有: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中国人征服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等等。以斯诺为代表的这些西方记者对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的采访报道,使毛泽东在西方世界中成为一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传奇人物。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宣传,西方记者对毛泽东的报道,使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以清新的形象出现在国统区和国际社会,大大澄清了国内外污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谣言。这些文章和著作在日后成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史料,特别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更是成为众多毛泽东研究学者的必读之书。

2.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发轫阶段

这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尽管这时的中外文化交流渠道不畅,但有些海外学者已开始有系统地收集有关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献资料,有针对性地开展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毛泽东学”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正如有海外学者见到毛泽东时所说“当你在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的命。”^{[3][P208]}这一时期,在海外逐渐形成了苏联、美国、日本等多个毛泽东研究的重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苏联学者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列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畴,高度赞扬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曾先后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文章。《毛泽东选集》在新中国出版后,苏联马上组织翻译出版了俄文本。苏联许多学者竞相发表文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苏联学者的影响下,欧洲的一些共产党理论家和左翼学者也都对毛泽东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美国的毛泽东研究是在逆境中开启的。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然指责著名中国学家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有过较高评价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纷纷遭到迫害。面对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一些学者并没有屈服,他们排除干扰,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和研究。1951年,施瓦茨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提出了“Mao-ism”(毛主义)这一专有名词。该书被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毛泽东研究的开山之作。费正清编辑出版了自己的

《1946—1950年著作和演讲选录》一书,用大量珍贵的资料向人们说明:虽然共产主义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好像是坏事,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却是好事。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费正清、布兰特和施瓦茨合作编写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资料》,这部文献资料影响了整整一代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

日本与中国有着地缘和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毛泽东研究成为战后众多日本左翼学者的研究领域。一方面,他们注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毛泽东选集》在中国出版不久,日本左翼学者就出了日译本。1952年,日本共产党曾组织翻译出版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单行本。很多日本学者围绕着毛泽东在哲学上阐述的与“矛盾”有关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毛泽东生平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毛泽东传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岩村三千夫的《毛泽东》和林华成的《新中国英雄毛泽东》等著作。

3.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高潮阶段

这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中苏关系由盟友转为敌对,而中国和美国、日本的关系却逐渐缓和下来。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文革”时期,毛泽东和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内部讲话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国外,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文革”的发生,也使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中国问题研究。

这一时期,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并围绕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自由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瓦茨和右派学者代表人物魏特夫等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毛主义”的争论一直延续到70年代。作为前德国共产党员的魏特夫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很高的造诣,但他从极右的反共立场出发,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只不过是苏联人所操纵的国际阴谋,而所谓的“毛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施瓦茨等人则认为,“毛主义”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独特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在自由派学者的强大攻势下,魏特夫逐渐败下阵来。但自由派中的一些年轻学者对老一辈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到了70年代,佩弗等“新左派”学者迅速崛起,围绕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对施瓦茨、施拉姆等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过,这些左派学者通常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在“新左派”的强烈攻势面前,有些自由派学者感到招架不住,纷纷表示要修正自己的观点。

这一时期,海外学者编译、出版了大量的毛泽东文献。这是因为参与争论的学者为了更好地支持自己的观点,需要到毛泽东的文献中寻找证据。施拉姆编译的《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和书信集(1956—1971)》在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影响很大。其他还有马丁主编的《毛泽东未公开的著作》、《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1960)》,以及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及其补卷,等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季刊》杂志也介绍过多篇毛泽东的文稿和评论方面的文章。

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学者,由于受政治变化的影响,一度出现了妖魔化毛泽东及其思想,歪曲和丑化中国革命历史的不正常现象。这一时期,中俄学界正常的学术交往日渐减少甚至中断,苏联和东欧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是一些批判性的论文,充斥着政治鞭挞和语言暴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大多出于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精神的敬佩,探讨反而要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活跃和客观得多。

4.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海外毛泽东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公开了大量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始档案材料,特别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发布,对海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带来了极大影响。他们纷纷对自己以往的毛泽东研究进行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一些海外学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学术观点,从而使海外毛泽东研究逐渐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不同学派之间在又出现了新的争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派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和索罗门的《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毛

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苏联学者耶基莫娃在《远东问题》杂志1982年第1期上发表了《美国汉学界中毛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一文,批评了派伊等人的研究方法,认为“毛主义”决不仅仅是毛之个体心理的反映,而是中国民族心理、社会心理的体现。这场关于毛泽东研究心理视角的讨论推动了毛泽东研究方法的拓展。毛泽东去世后,海外学者围绕着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即重新评价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986年,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的论文专辑,其中斯塔尔的《“正确”和“错误”:毛泽东思想研究以及对毛的政治思想重新评价》一文最具代表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机械地区分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这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加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过去,海外学者并不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中共高层党史专家的著作逐渐成为海外毛泽东研究专家的关注热点,特别是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出版后,海外学者很快就将其翻译过去并进行深入研究。他们认为该书所引内容是值得关注的。到中国来进行学术访问的海外学者也逐渐增加。1980年,中国社科院首次接待了施拉姆带队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代表团,其中有迈斯纳、弗里德曼、特里尔等知名学者。施拉姆本人也先后10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曾在中国社科院、军事科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研究和教学机构做过多场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报告,与胡乔木、胡绳等我国毛泽东研究的专家进行过深入的学术交流。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也经常召开,如2003年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同时表彰施拉姆对毛泽东研究作出的贡献,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毛泽东研究学者开始走向正常发展的态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极力从当代中国的研究中,寻找到让本国发展的有效路径。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里布亚琴柯的《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季塔连科的《中国的文明与改革》等。

二、海外学者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由于海外学者受各自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最杰出的人物、最伟大的领导人、是光芒四射的智者之一。

1.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施拉姆曾说:中国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毛泽东决定的。如果抛开了毛泽东,人们既不能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能深刻认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他在20世纪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美国学者纪文勋认为,毛泽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人,是影响最大的人。毛泽东的影响不是单方面而是包罗万象的,涉及政治、经济、个人生活和思想诸多领域。毛泽东“敢叫日月换新天”,建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毛泽东理想中的伟人既有渊博的学识又有卓越的政治智慧,而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既有学识(马列主义知识和文学天才),又有卓越政治智慧的伟人。日本学者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一生的人物。把他放到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研究,他应该在中华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把一个国家放到历史的舞台上了。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4][P20]}美国学者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中国革命的化身。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毛泽东永远与中国和世界同在。

针对有人诋毁毛泽东的功绩,很多海外学者给予了批评。澳大利亚学者泰维斯指出“由于毛泽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所追求的目标和取得的成就,因此,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员们的终生信仰。”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5][P127]}美国学者派伊也认为,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毛泽东都应属于我们这个世纪少数几个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出生并成长于偏僻而闭塞的19世纪的中国农村,但崛起并承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并用历史上影响最广泛和最

力的政府管理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毛泽东还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代伟大政治英雄中活得最久的一个。

2. 毛泽东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为中国崛起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主张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曾照搬过苏联模式。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发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探寻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施拉姆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未来的经济工作格局,不再像苏联那样片面强调重工业是唯一的关键部门。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始设计一个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而“大跃进”的发动则标志着彻底地公开同苏联模式分道扬镳,毛泽东已经奠定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毛泽东虽然没有打完中国革命这只“草鞋”,但它已经基本成型,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未来的漫长岁月里,都带有他的鲜明印记。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取得了社会和平与安定,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基本上的平等分配;毛(同其他领导人一样)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6] (P49)} 在多数海外学者看来,毛泽东是新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创造者的作用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不能置疑的。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真正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纪文勋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贫苦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迅速的提高,同时妇女的地位也有了巨大提高;士兵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改变了过去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物质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20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称之为伟大而具有重大意义。^{[7] (P175)} 很多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毕生都在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努力。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施拉姆说:在毛泽东“主宰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全部27年里,毛从未停止过号召经济进步,并且号召用数量单位下了定义的进步:多少吨钢,多少吨粮,等等”。“1956年1月,他宣布,为了达到‘在几十年内消灭中国经济上、科学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的‘伟大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是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主张培养大批有现代知识的技术人才。^{[8] (P11)} 施拉姆还指出:就经济发展而言,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对现代化和工业化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美国学者特里尔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其中按劳取酬是最主要的表现。中国的收入分配是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并且,中国的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等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特里尔特别强调: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是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前西德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也认为,毛泽东有三大功绩:一是政治上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让人民群众都有房子住,丰衣足食。二是通过按他的设想改造中国的政策消灭了瘟疫和流行病。三是“通过以他本人为象征的政策和学说,使8亿人民又获得了在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9] (P302)}

3.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对第三世界国家有着重大影响,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

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整个世界革命也有着重大影响。施拉姆指出:在争取中国独立和民族尊严方面,毛泽东身上充满着不妥协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国家变成了在国际社会受到尊敬的一员。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毛泽东一开始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的威胁,后来又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的威胁,但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强调: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自身利益,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服务于第三世界的利益。施拉姆特别强调,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毛泽东关于在不发达国家里如何夺取政权的理论将继续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迪克·威尔逊指出:毛泽东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共产主义从无产阶级的发源地欧洲解放出来,并将其基本原则应用到其他国家。毛泽东企图用适用于人类社会所有发展阶段和可以为各种类型的变革提供依据的普遍性范畴重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毛泽东把农民放在提前为工业无产阶级精英准备好了的马克思主义地图上。应该说,在很多方面,毛泽东是代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讲话和行事的。

毛泽东作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人,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早在上世纪70年代,A. L. 罗斯就明确指出:毛泽东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领袖——或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也说“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10] (P313)} 特里尔更是明确指出: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相比,都要剧烈得多。毛泽东为古老而庞大的中国在上世纪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尊重。“作为主宰人物,在20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就是一位巨人。”特里尔还进一步指出“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60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人格化身,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族实施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在特里尔看来,毛泽东在世界的影响,也许只有罗斯福、列宁、丘吉尔等少数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11] (P36)}

海外学者也认识到,毛泽东在晚年曾犯有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毛泽东传记的英国学者威尔逊就明确指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对毛泽东这样的英雄人物不应该过于吹毛求疵。许多中国人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都为有这样的一位民族英雄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尽管毛泽东晚年犯有过失,但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他不愧为当代世界最具魅力的政治家。

三、海外学者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施拉姆曾说:毛泽东留给中国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更像某种类似体系的东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

1. 毛泽东十分注重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并揭示了其基本内涵。施拉姆指出“1938年10月,毛在其号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性著作中,界定这一词汇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点,意味着毛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表达它。”“毛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采用‘民族形式’,而‘民族形式’不仅包括从中国过去的典籍引章摘句,更要吸取其精神实质。”^{[12] (P11)} 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指出:在中国固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条件下,毛泽东经过理论思维,在思想上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达到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概念,从而取得了理论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农村以武装力量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和夺取政权,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施拉姆对毛泽东两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次是1938年毛泽东在即将与国际派(即亲苏派)摊牌的情况下,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心再次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寻找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于是第二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是易于让人理解的。因为面对共产国际的专横跋扈,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会极大地伸张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在于它是党内斗争的有效武器,而且还在于其在民族危急的紧急关

头可以成为诉诸非共产主义观点的口号。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所有革新中,没有什么比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根本,更为意义深远了。在把民族目标和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毛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可更广义地说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它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样的做法也发生在毛重构马克思主义这一工作的根基处,发生在他要求在全球马克思主义中有中国的声音这一行为中,这一做法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意义极为深远的。”^{[13] (P213)}

在有些海外学者看来,毛泽东在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还极力倡导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们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用普通民众和大学教授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使之地方化,以便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一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还论述了毛泽东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关系。王袁吾就指出:在大多数场合,毛泽东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解说马克思主义,使其变得通俗易懂,很容易被一般中国人接受和掌握。毛泽东的有些解释可能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但要比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去读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更有成效。

2.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在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学者冈田春夫指出“毛主席的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不论是作为革命的思想,作为政治思想,还是在哲学领域,都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换一句话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这样世界历史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4] (P177)}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指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只是在谈到理论的检验过程时才使用‘实践’这一词。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反复提到的只不过是理论正确与否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提出革命理论只能来源于实践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15] (P127)} 在新岛淳良看来,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并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没有提出过的问题,重新提出并解决了列宁提错了的问题,同时又继承了列宁提出的仍然有效的问题。

更多的学者从某一方面对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如窦宗仪认为,毛泽东在辩证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窦宗仪说:事物变化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说明事物如何变化、以什么方式发生变化、为什么变化。辩证法的观点具有真理性,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某些问题上缺乏彻底性。毛泽东提出事物具有内在矛盾性的论断、矛盾的对偶性、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等观点,论证了量变和质变相互转化的性质以解决转化中介环节问题等,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飞跃以理论性解释。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施拉姆指出:毛泽东在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一是强调了社会革命和产业革命区别,提出社会革命还包括对人本身的改造;二是重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善于倾听人民的呼声,否则就会腐化;三是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认为中国的农民更有能力建设新社会。曾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就指出: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力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

3. 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海外学者多数认为,尽管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处于转型之中,但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想会影响几代中国人。西哈努克亲王说:毛泽东“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他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的哲学味道比政治味道更浓,同佛教理论的最精华部分没有什么矛盾。我觉得他的思想在日后好几代人里还会是适用的”。“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他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知识结合在一起。”^{[16] (P246)} 改革开放后,中国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重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他们还会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美国学者怀特指出:北京新的领导人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并将在某种程度上有意降低其作用,但绝不可能像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进行“非毛化”运动。施拉姆认为,在中国改革之初进行的是“非神化”,而不是“非毛化”。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坚持和发展。有学者指出,毛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不再使用了,但毛泽东思想中许多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的。施拉姆指出:毛泽东没有在哪方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其去世以后,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批评或限制,有一些则被完全抛弃。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和他的领导能力的影响仍是十分深刻和广泛的,以致有充足的理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毛泽东的中国”。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尽管毛泽东思想留下的印迹已经在这里或那里被人忘却或被人消除,但其基本原则至今仍然被人运用则是个无可置疑的现实。国外学者认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观点、独立自主政策、追求社会公平思想等,在当前构建和谐、实施科学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J]. 党的文献, 2014(1).
- [2] 金冲及. 毛泽东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3] [美] 斯诺. 漫长的革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4] [日] 竹内实. 中国历史上的四位伟人[A]. 萧延中.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5] [澳] 泰维斯. 毛泽东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A]. 萧延中.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6] [英] 迪克·威尔逊.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A]. 萧延中. 在历史的天平上[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7] [美] 纪文勋. 毛泽东: 一个近代思想史的评价[A]. 萧延中. 在历史的天平上[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8] [美] 施拉姆. 简评毛泽东[A]. 萧延中.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9] [德]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三大功绩[A]. 郭思敏. 我眼中的毛泽东[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 [10] [美]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可能要斗二、三百年”[A]. 郭思敏. 我眼中的毛泽东[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 [11] [美] 特里尔. 毛泽东的肖像[A]. 萧延中.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12] [美] 施拉姆.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A]. 萧延中. 在历史的天平上[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13] [美] 阿瑞夫·德里克. 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A]. 萧延中. 在历史的天平上[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14] [日] 冈田春夫. 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A]. 郭思敏. 我眼中的毛泽东[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 [15] [日] 新岛淳良.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A]. 萧延中. 在历史的天平上[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16] [柬] 诺罗敦·西哈努克. 第七次中国之行[A]. 郭思敏. 我眼中的毛泽东[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郭荣华)